

怀念母亲

□章如本

时光如流水，冲刷不去深藏心底的思念；岁月虽无声，却无法磨灭那份永恒的记忆。母亲离世已逾十三载，屈指算来，今年本是她98岁寿辰。

母亲娘家在白泉十字北路翁家桥头，离我们家相距不远。她在家中兄妹四人里排行老大。18岁那年，母亲与父亲结为连理，生下我们兄妹五人。从此，她含辛茹苦，勤俭持家，将我们五个子女抚养成人，并帮衬着成家立业。

一

在那个物质匮乏的年代，母亲用她柔弱的肩膀扛起了子女求知的天空，她的远见与执着成了我人生路上最早的灯塔。母亲虽是一位大字不识的农家妇女，但她深知文化的重要性，因此想尽办法要让子女读书。然而，家中负担实在太重，收入微薄，大姐小学毕业后，只能被迫到生产队放牛，赚些工分补贴家用。我小学毕业后，曾到白泉中学读过一学期初中。但到了第二学期，因两元一学期的学费无法交齐，无奈中途辍学。

1967年，读书的机会终于来了。当时大队长找到我，问我是否想继续读书。他说现在不用交学费，还有助学金补贴。我把这个情况告诉母亲，她当即表示同意：“这么好的机会不能放弃。”她坚信孩子不读书就没有出路。于是，我得以重新背起书包，走进了白泉中学半耕半读班。那时我入学的年龄比其他同学要大两岁。

小时候我很顽皮。白泉有一条万金湖，河水清澈见底，我喜欢玩水，天热时常泡在河里不肯回家。可能入秋后多泡了导致体寒，我患上了严重的少儿哮喘病，发作时呼吸声像拉风箱一样大。母亲心急如焚，可那时缺钱少药。于是每当晚稻收割后，母亲便会杀一只新养的母鸡（俗称新草鸡），蒸熟后熬成鸡汤，再用新糯米烧成干饭给我吃。这样连吃了三四年，到我17岁那年，哮喘病竟奇迹般好了，至今未曾复发。

二

母亲勤俭持家，精打细算，把一家子的日常生活、衣物鞋袜打理得井井有条。参加完生产队繁重的劳动回来，忙完一大堆家务活后，母亲总是坐在昏暗的煤油灯下，为我们五个子女缝补新旧衣服和鞋子。

母亲的善良淳朴，如同一束温暖的光，照亮了周围人的生活，也赢得了乡邻的敬重。母亲非常善良，待人接物总是彬彬有礼，落落大方。1962年，白泉十字街开设了第一家电厂营业所，房子就借住在我们院子里。他们有时要烧饭做菜，母亲总是倾其所有，借东西给他们，有时还帮他们烧菜烧饭。母亲同街坊邻里的关系也非常好，

总是乐意帮忙。

爱不仅仅是血缘的延续，更是对他人的无私关怀与温暖，母亲用她的行动诠释了什么是大爱无疆。母亲一生除了养育我们五个子女成长，同时也抚养了我们的下一代。那时，姐姐生了一个孩子养在我们家，姐姐和姐夫在遂昌工作。几年后，姐姐又生了一个，母亲便去那边照料。回来的时候，母亲带着两个孩子，还有大包小包的行李，千里迢迢从上海乘火车，再转乘轮船到家。真难以想象，一个斗大的字也不识的农村妇女是如何带着孩子辗转回家的，这正是母亲的可贵之处。

母亲不但养育了我们五个子女的下一代，还领养了其他孩子。在白泉工作的张同志有两个小孩，基本上都是母亲给养大到十多岁的，两个孩子都叫我母亲为“妈妈”。在母亲过世时，他们都曾来吊唁。

三

世间最动人的爱情，莫过于相濡以沫、生死相随，父亲用一生的相伴诠释了这份深情。父亲和母亲非常恩爱，虽然有时生产队劳动累了，或碰到不开心的事，母亲总会埋怨父亲几句，但父亲总是一声不吭，默默地拿起工具下地干活去。

父亲本命属牛，他的性格和干活劲头真像一头老黄牛。每年生产队清明前哺育稻谷秧的重任，总是交给父亲担任。“双抢”期间，那头耕牛也总是交到我父亲手里，耕田、炒田、耙田一样不落。

父亲60多岁时，到白泉玉苑幼儿园担任门卫工作。父亲一有空余时间，就把周围的花苗树枝修剪得整整齐齐，有空时，他还扎扫帚、修理垃圾漏斗，帮幼儿园老师擦洗自行车和打气，一刻也不愿意空闲下来。在幼儿园工作将近十年，因年纪大了才回家休息。

父亲和母亲结婚七十年来，两人相敬如宾，从未听到过他们争吵。母亲对父亲照顾得非常体贴，父亲喜欢吃甜食，母亲总是第一时间预先准备好。父亲89岁那年，一天早上，母亲给他煮了几只猪油汤团，父亲吃好后没过多久，便呼吸不畅，缓不过气来，随即去世了。为此，母亲感到非常自责，时常对我们讲，不该给父亲吃猪油汤团，否则父亲不会这么快就走了。我们劝她根本没有这回事，是父亲寿命到了，但母亲始终无法释怀。

在父亲走后的五个月，母亲感到胃部不适，去医院检查，最后结论是恶性肿瘤晚期，已无药可救。回家住了十多天后，母亲最终也跟随父亲驾鹤西去。对于当初没有陪母亲去上海大医院治疗，也成为我一生中遗憾的一件事。

愿父母在天国安好，谨以此文纪念母亲98岁寿辰。

愿天下所有儿女都要孝奉双亲，善待长辈，莫留遗憾。

母爱有声

□海天

站在母亲的坟前，风从黄杨尖的山谷间吹过，带来四月草木的芳香。耳边，似乎又响起母亲唤我回家吃饭的声音……

母亲的嗓门确实大得惊人，丝毫没有女性惯有的细软。小时候四处疯跑，每到傍晚5点光景，村子上空像被点爆了一样——“阿军哟，吃饭来嘞……”我晓得，那准是母亲在喊我。伙伴们听见了，总要打趣：“哎，又是你阿姆在叫你了。”那喊声就是命令，像军营里的号角，召我回家。夏日里酷热难耐，我瞒着母亲下水塘戏水，正玩得尽兴，便见她手持竹竿，嘴里不住地嚷：“小鬼，危险不晓得啊，谁让你汰肉的！”这声音粗犷、干净、有力，伴我走过了整个童年。

当然，母亲的声音并不总是这样的。

父亲从生产队回来，吃饭时从怀里掏出一只女式手表递给母亲。母亲的脸马上红了，泛起少女似的红晕，一边嗔怪父亲乱花钱，一边忍不住将那只上海牌手表戴在腕上，高兴得连声说：“啊呀，刚刚好，刚刚好……”那一刻，她的声音激动而喜悦，清亮得像山涧的泉水。那大概是我记忆中母亲最接近“柔美”的一次声音，可惜这样的机会，实在稀少得可怜。

后来，我和哥哥一起读高中，家里的担子全压在父亲身上。母亲不忍心，便与父亲商量，要像男人一样去锯板。冬天顶着凛冽的海风，夏天冒着炽热的日头，她和男人一道拼力气，心里只有一个梦想：让日子好起来。就是在那些年，母亲完成了一次蜕变——她抛下了女性的矜持与柔弱，在男人的群落里赢得尊重。她的身板更粗了，嗓门更大了，晚上我甚至能听见她打呼噜的声音。每每想起这些，我的心便隐隐作痛。

我第一年高考落榜，正是家里最困难的时候。父亲已联系了村里的泥匠，母亲却有一万个不甘。晚上，我听见母亲与父亲争执，听见她说“我看小儿子是块读书的料，半途而弃实在可惜”，泪水不自觉地落了下来。最终母亲赢了。

八月份，她冒着酷暑去定海相关学校替我打听复读的事。我的成绩不太理想，老师有些为难，母亲第一次在一个陌生人面前说了谎：“我这娃成绩向来很好的，只是临近高考发热，身体不适，所以考试没发挥好，老师你就再给个机会，他一定会好好读书的。”她的诚心感动了老师，学校同意录用我。

后来，我考入舟山师专，毕业教书，有了稳定的工作；哥哥考取了大副证书，家里的日子渐渐好转。当人家说

“你家儿子有出息”时，她掩饰不住地笑笑，那笑容里有欣慰，也有几分不易的释然。

2012年，父亲查出肺癌晚期。那些日子，母亲像换了个人似的，她不再只是那个嗓门洪亮的女人，而成了一个守在病床前寸步不离的妻子。父亲因病痛折磨，偶尔冲她发脾气，她也不恼，只是默默地抹眼泪。父亲走的那天，母亲像被抽去了脊梁骨，整个人瞬间垮了下来。我赶回家时，她已经哭不出声了，只是呆呆地坐在那里，嘴里念叨着父亲的名字。

父亲走后，母亲一下子老了许多。经常一个人坐在院子里发呆，眼眶红红的。她原本身体不太好，常年被“房颤”折磨，还有高血压等。那些年，我陪着她往返于老家和医院之间，看病的间隙，她总要提醒我：“阿军，阿姆看病，你要记得向领导请假，千万不要耽误了工作啊。”

2023年下半年，母亲突然中风，还没等我们缓过神来，又被查出绝症。住院的那些日子，母亲的声音越来越微弱。她经常喊热叫痛，甚至央求我去找冰块贴在身上。她开始抱怨医院的空气不好，念叨着家里的庄稼地没人打理。出院后，她的食欲越来越差，我问她要吃什么，她木然地盯着我，虚弱地说：“囡啊，买点草莓给阿姆吃吧。”我跑去买了她最爱吃的草莓，喂她吃的时候，她的脸上露出了一丝微笑。没过几天，母亲更加虚弱了，最后无法说话，只能微微转转眼珠。看着亲人、邻居一个个来看她，她想说，话却堵在喉里，说不出来。

母亲走了。连同她的声音，一起消失在我的世界里。夜深人静之时，我会想起她的声音——想起她洪亮的喊声，想起她喜悦的笑声，想起她在父亲病床前无声的哽咽，也想起她在病房里那些含混的呻吟。她的声音是低微的，有时甚至是粗犷的，可她从不乞求什么，只是怀揣着一个简单的梦想——为了家庭，为了子女，她愿意付出所有。

母爱有声，这声音从她口中发出，落在我心上，便成了一生无法磨灭的回响。

